

减税降费、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吴潇航¹ 龙小燕²

(1.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部署,财税政策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进行再配置,对产业结构升级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选取的2004年—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验证后依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应推进宏观税制结构优化,统筹考虑税制“减税”与征管“简税”,提升产业链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从而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减税降费 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4)06-0059-10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瞩目成就,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过去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和资源消耗为表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转型相对滞后,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依然存在,高端产业面临比较优势不足,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逐渐陷入“中国悖论”的怪圈(陈浩、

魏哲海,2016)。加快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是实现经济集约式和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强劲引擎(李静、楠玉,2019;杜金岷等,2020)。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减税降费是助企纾困政策中最具有含金量、经营主体受益最明显的政策。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设定合理自治的政策措施,既有利于扩大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

[收稿日期]2024-01-03

[作者简介]吴潇航,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府绩效评估、产业组织与管理;龙小燕(通讯作者),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政府投融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社区营造助推精准脱贫的机理建构及路径改善问题研究”(19XMZ09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阐释与进路研究”(23SKGH067)。

产力,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税收的角度探究减税降费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路径机制,对于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经济学研究中减税降费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作用已被证实(郭凯明、龚六堂,2023)。部分学者认为普惠性减税降费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各司其职,不仅能压缩企业制度性经营成本,还能矫正生产要素错配,有序引导过剩产业逐步退出(马金华等,2021)。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表明,减税降费主要通过促进要素配置优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行、激发微观主体市场活力和稳定市场预期等路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李紫薇,2021)。此外,甘行琼和蒋炳蔚(2019)使用门槛模型探究了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减税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有异质性和非线性影响,应适当降低第三产业税负,提高第二产业税负。欧阳华生等(2015)研究表明,减税降费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通道会更加顺畅。上述研究均表明政府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减税降费也会有失灵的可能。张双龙等(2022)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区域导向性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研发的激励效应并不明显,部分技术水平不高的企业也享受到了优惠待遇,不仅造成市场竞争失灵,还会带来政府资金错配。地方税收总量竞争和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可能对产业结构升级更有益处,或是减税降费使宏观税负偏离最优区间,其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会偏离预期(张学升,2021;魏升民等,2022)。张国庆和李卉(2019)认为,总量税收竞争和分税种税收竞争会显著抑制产业结构升级。黎

文靖和郑曼妮(2016)指出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为主的激励政策仅仅激励了相关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用性发明和专利授权量并未因激励政策而呈现明显增长,政府政策对于产业升级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效应及方向尚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另外,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表明,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流程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还会充分发挥其“示范效应”和“鲑鱼效应”,引领并推动区域内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和绿色环保型为核心的产业转型,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朱于珂等,2021)。原毅军和戴宁(2017)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绿色创新与制造业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绿色技术创新通过马太效应来实现制造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最终有利于产业升级的结论。刘在洲和汪发元(2021)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但财政资金约束下的绿色技术创新反而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彭崇清(202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级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

现有研究就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为本文内在逻辑关系提供了理论铺垫和方法借鉴。但在环境约束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税费优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可能的创新性在于将减税降费、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放到同一分析框架,揭示减税降费如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本文所得结论对于应对“三期叠加”挑战,确定税制优化目标,中长期保

持合理的减税规模,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减税降费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减税降费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直指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聚焦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实行的减税降费政策具备偏向型和实践指向型特征。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精准、更可持续”的要求,系列政策围绕着助力实体经济、研发装备、重点产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发展等方面减税政策的优化完善,能刺激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以充分利用政策红利的意愿增强。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11月,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达455.4万户,占全部新办户的30.1%,较上一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

我国实行的减税降费政策具体表现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和其他三本预算收入的降低,其“全口径”对应着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整体税负降低(白彦锋,2020)。宏观税负总量规模与税制结构变动对于供给端和需求端均会产生影响。

在供给侧端,减税降费带来的降成本和增收机制可以促进产业部门内部要素相互替代或产业部门之间产品相互替代和迭代升级,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郭凯明、龚六堂,2023)。减税降费意在提高政府财税政策调控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质量的能力,借助于价格和抵扣渠道,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作出响应,最终实现有限的社会资源流向生产效率

更高的产业或项目的目标,产业结构得到重塑和调整(李永友、严岑,2018;彭晓洁等,2023)。分税种看,所得税负担的高低直接关联企业的现金流量与留存收益,影响着企业的要素禀赋、研发创新和管理模式等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分配。减税降费改变了政府和企业间的财富分配,尤其是以“营改增”为代表的减税实现服务业内部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使企业拥有更多的留存收益,缓解融资约束和现金流压力。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例,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能够使研发投入多的企业享受到更多的税收减免,有助于在社会层面引导企业形成“政策引导—研发投入—效益提高—追加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

从消费者需求端来看,由于税制和税率的变化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居民收入,还会通过实行对最终产品选择性征税或差异性征税来引起价格变动,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行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节能环保、“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等先进类别的企业在税费方面享有的专项政策更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反映在消费价格上,即差异化的税制使得高效率生产部门产品成本下降,高品质、低价格更易受到消费者青睐。

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双重刺激激励着企业业务调整 and 战略转型,这有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储德银、纪凡,2017)。综上,税收政策通过调整不同产业部门的税制、税率、税基和行政收费等措施实现分工效应和税负效应,促使企业加大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减税降费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

(二)减税降费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减税降费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项措施的具体反映,在自然资源渐进枯竭和生态承载力逼

近极限的现实背景下,涉税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的过程中还被赋予了生态功能,例如资源税、排污费、车船税和土地占用税等广义绿色税收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税率和优惠等环节会更青睐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鼓励和倡导企业以绿色技术创新来塑造核心优势。政府在利用税费优惠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形成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而环境监管和公众环保意识迫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和履行环境责任以获得社会“合法性”,形成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反向倒逼机制”,两股力量合力推进企业改造升级和产业优化(肖静等,2023)。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绿色技术创新在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模型构建与检验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要求是生产要素由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并最终倒逼低生产效率的部门退出市场或结构性重组以实现产出效率的提高(周诚君,2021)。从动态演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前者涉及产业间生产规模比例关系和投入产出关联的协调,而后者产业投入是低位的更迭(郭旭等,2021)。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参照付凌晖(2010)的研究思路,采用改进的结构相似系数法进行测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算方法参照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思路,采用泰尔指数进行测算。

2.解释变量——减税降费

现有文献在衡量政府减税降费力度时多采用

宏观税负总规模或地级市相关部门出台的减税政策(尹李峰,2021),但这些指标无法反映减税降费政策的变动幅度或经济效应。减税降费最直观的反映是政府财政收入压力增大和宏观税负下降,是一种税收收入增量幅度的下降,因而,本文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情况能够较好地衡量减税降费效果。假设 Tax_t 表示当期政府财政收入总量, Tax_{t-1} 表示上一期的财政收入总量,可得到财政收入增速为 $Tax_{s,t} = (Tax_t - Tax_{t-1})/Tax_{t-1}$,则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动速率为 $Tax = (Tax_{s,t} - Tax_{s,t-1})/Tax_{s,t-1}$,即年份 t 与年份 $t-1$ 收入增长增速的变动情况。但上述式子测算的是 t 到 $t-1$ 期的减税降费情况,为实现全局参比,使用定基功效函数进行改进,以2002年公共财政收入为基期,可得到 $Tax_{s,t} = (Tax_t - Tax_{2002})/Tax_{2002}$ 。

3.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申请(授权)量两个变量作为代理变量(齐绍洲等,2018;李鹏升、陈艳莹,2019)。考虑到专利数量能够很好地度量绿色技术创新动态,且能够较好反映企业当期的实际创新能力(齐绍洲,2017),使用绿色专业申请量来表征绿色技术创新。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来确定绿色专利的种类和IPC分类号,再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数据进行匹配得到绿色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总和。

4.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对模型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现有文献(任爱华等,2022;孙伟增等,2022;贾敬全、陶冶,2023),本文选取了五个变量来控制省(区、市)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城镇化($Urbr$)使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收入差距

(Gini)使用洛伦兹曲线图中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的比值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人力资本(Cap)使用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研究中心基于修正的Jorgenson–Fraumeni方法测算的实际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各省(区、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人民币)来衡量;道路通达度(Road)使用年末公路总里程来衡量。

(二)模型设定

针对研究假设,本文利用宏观层面数据,通过拟合年份和地区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TG_{it} = a_0 + a_1Tax_{it} + \sum_{j=1}^n \gamma_j LnControl_{jit} + \varepsilon_{it} + \nu_i + \mu_t \tag{1}$$

$$LnTL_{it} = b_0 + b_1Tax_{it} + \sum_{j=1}^n \lambda_j LnControl_{jit} + \varepsilon_{it} + \nu_i + \mu_t \tag{2}$$

式(1)和式(2)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年份;*TG*和*TL*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包含除宏观税负以外的其他控制变量;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服从白噪声过程;*a*和*b*表示待估系数。 μ_i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ν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4年—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统计样本剔除了港、澳、台和西藏四个地区的数据。各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以及EPS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ISPO)。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为缩小数量级,本文对变量做了对数化处理。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高级化	480	0.064	0.381	-0.641	1.655
产业结构合理化	480	-0.024	0.389	-1.384	0.903
减税降费	480	0.729	0.720	-0.433	4.077
城镇化	480	3.952	0.261	3.254	4.495
道路通达度	480	2.291	0.877	-0.249	3.518
人力资本	480	7.869	0.939	5.037	9.916
外商直接投资	480	10.741	1.472	6.551	14.485
收入差距	480	-1.432	0.377	-4.031	-0.604
绿色技术创新	480	6.991	2.119	-3.302	11.116

(四)单位根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尽管本文采用的数据结构为大N小T的短面板数据,但为了有效避免宏观经济数据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干扰,采用假设存在同质面板单位根的LLC和Breitung检验法以及假设存在异质面板单位根的IPS、PP-Fisher、ADF-Fisher进行检验。五个检验方法结果表明所选取的各个变量为一阶平稳,只能将差分后的变量纳入模型进行考察。将差分后的数

据代入数理模型会降低模型的经济意义,对此,本文采用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若存在长期互动关系,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原始变量进行拟合计算。Kao检验、Pedroni检验以及Westerlund检验的结果显示,所设定模型至少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各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另外,为检验模型设置是否合理,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其结果显示,平均

方差膨胀因子和单个变量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的情况。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常用的面板数据估计模型有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随机系数模型(RE)和固定效应模型(FE),具体哪种模型更适合需要进一步检验。似然比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的P值均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拟合模型。考虑到时间趋势和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影响较大,文章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鉴于面板数据面临着异

方差、截面相关和自相关的问题,而一般的聚类稳健标准误难以处理截面相关的问题,本文使用Driscoll-Kraay方法来调整标准误以得到更为一致的估计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未纳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052和0.061,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纳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方面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047和0.045,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政府施行的减税降费政策显著促进了国民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与三次产业的合理化配置。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TG		TL	
	(1)	(2)	(3)	(4)
减税降费	0.052** (2.84)	0.047** (2.47)	0.061*** (4.61)	0.045*** (3.55)
收入差距	—	0.053** (2.52)	—	0.117** (2.48)
道路通达度	—	-0.116* (-1.81)	—	-0.013 (-0.46)
城镇化	—	-0.565*** (-3.90)	—	-0.435*** (-4.22)
外商直接投资	—	-0.038 (-1.39)	—	0.015 (0.44)
人力资本	—	0.063 (0.87)	—	-0.259*** (-3.29)
常数项	—	2.177*** (4.97)	—	-3.398*** (-6.63)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拟合优度	0.6871	0.725	0.5553	0.598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t统计量。

(二)内生性检验

尽管本文尽可能地控制了个体异质性以减缓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是产业结构和税收之间的反向因果内生关系仍制约着文章在

因果推断方面的严谨性。为消除反向因果内生性对模型拟合结果产生的干扰和增强文章因果推断的有效性,参考陈楠和蔡跃洲(2022)、周骁和郭树华(2023)的实证思路,本文将静态模型转

换为动态模型,并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来对转换后的动态模型做回归计算。该方法是模型满足一定矩条件时形成的一种参数方法,能有效解决或排除动态面板偏差,以及内生性问题(王毅等,2022)。由表3中SYS-GMM的结果可知,序列相关检验表明不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显示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表明本文建立的动态模型是有效的。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139和0.178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实施减税降费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

(三)稳健性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基于减税降费的视角,若减税降费的同时经济仍保持增长,税基相应扩大,微观企业主体税负普遍下降的同时,税收收入仍然可能增加。因此,可以采用将中口径税负更换为以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收入总和的小口径进行表征减税降费。由表3的FE模型可知,将减税降费的代理变量更换为小口径税负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统计关系和显著

性均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可以认为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是稳健且可靠的。

二是更换模型。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通常与邻近区域的经济活动相关联,区域间的经济活动规律表现为具备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依赖性。若忽视经济变量间的地理相关性,其估计结果是有偏差的。徐青(2021)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地区)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会受到邻近国家(地区)的影响,同时,本地区实施的税制政策亦会影响其他地区行政部门的税收政策,即某区率先采取相关税收行为将会自然而然地刺激邻近地区采取相应行动。为充分反映经济事物间的空间依赖,本文将传统二维面板模型拓展为兼具时间、地点和距离的三维面板,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拟合。因空间计量模型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受到地理权重矩阵的影响较大,为增强结论的可靠性,空间权重矩阵采用2004年—2019年各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和省会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共同构建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由表3的SDM模型可知,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仍是成立的,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SYS-GMM		FE		SDM	
	TG	TL	TG	TL	TG	TL
滞后项	0.868*** (9.44)	0.855*** (14.60)	—	—	—	—
减税降费	0.178** (2.39)	0.139** (2.12)	0.013* (2.02)	0.054** (2.22)	0.038** (1.97)	0.047** (2.41)
AR(1)	0.073	0.002	—	—	—	—
AR(2)	0.612	0.111	—	—	—	—
Sargan 检验	0.983	0.168	—	—	—	—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50	450	480	480	480	48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t统计量。

五、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同时参考已有文献的思路(江静琳 等,2018;宋弘、陆毅,2020),使用分样本和构建交互项的方式来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在减税降费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机制作用。由表4可知,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121和

0.069,且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两者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074和0.012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纳入绿色技术创新和减税降费交互项的模型结果显示,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019和0.064,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

表4 机制检验的结果

变量	TG			TL		
	绿色创新较高	绿色创新较低	交互模型	绿色创新较高	绿色创新较低	交互模型
减税降费	0.069*** (5.87)	0.012 (0.53)	0.045* (1.78)	0.121** (2.76)	0.074 (1.32)	0.079** (2.36)
绿色创新	—	—	0.103*** (3.07)	—	—	0.057** (2.02)
交互项	—	—	0.064*** (4.80)	—	—	0.019*** (6.1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68	212	480	268	212	480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报告的是t统计量。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4年—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该结论经过一系列验证后依然稳健。分样本检验和交互项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均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减税降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发挥减税降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1. 优化宏观税制结构,降低微观主体税负痛感

税费支持政策要持续完善、优化,不断增强精准性、针对性,发挥政策的最大效能。我国宏观税负的主要症结在于税负结构不合理,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两相脱节。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增强市场主体税负承受力的重要发力点在于全面优化宏观税负结构,以结构优化推进宏观税负水平趋于合理。应系统梳理现行各项非税收入,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的同时,要严防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加重经营主体负担。通过建立防治并举的监管长效机制,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保证减负让利不走样、不打折。

同时,分类归并各种同类型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力促减税降费政策从碎片化转向制度化、协同化的政策集成体系。实施税费优惠政策要把红利集中在最需要纾困的经营主体上,把政策发力点放在科技创新等关键环节上,加强政策宣介和辅导,精简办理流程,确保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动态跟踪减税降费的实时效应和迟滞效应,及时评估政策福利效应。适时推进社会保障、土地出让等多个领域“费改税”政策,深挖增值税和所得税降税潜力,重点实施普惠性和便捷式税率减负政策,切实加强市场主体对减税降费的感知力,提高减税降费执行效率,以更加平衡和更加稳健的税制改革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是仍要保持查处涉企违规收费的高压态势,防止违规收费抵消税费优惠政策红利。

2. 保持合理自洽的减税规模,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在推行长期性、持久性和连续性的减税降费过程中,我国税制改革仍面临降负与提高财政支出质量的矛盾。尽管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换经济发展动能,但是税率降低意味着财政压力和债务风险增加。实施税费支持政策要把握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算大账、总账、长远账。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减税降费上升到现代财政治理的高度,坚持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逐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与财政考核绩效细则。统筹考虑税制“减税”征管“简税”与提高财政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放水养鱼”涵养税源、深度优化税基、盘活政府经营性国有资产等多渠道稳定宏观税负总水平,严格防范和缓解财政风险。

3. 完善财税激励政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资金约束是制约企业绿色投资的主要障碍,不利于产品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要有针对性地完善企业绿色创新、研发与投资等相关的绿色税制,不断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搭建起以环境保护

税、资源税等“多税共治”的税法体系,以及以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政策体系,并逐步完善绿色税收的覆盖范围,构建差异化税率。对企业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的行为可通过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进行正向激励,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则须加大税负进行负向惩罚,诸如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促使企业采取减排措施,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排放。

参考文献:

- [1] 陈浩,魏哲海.地方政府土地经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经评论,2016,7(5):18-29.
- [2] 李静,楠玉.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J].经济研究,2019,54(8):152-166.
- [3] 杜金岷,韦施威,吴文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6):38-49.
- [4] 郭凯明,龚六堂.减税降费与产业结构变迁[J].经济学(季刊),2023,23(05):1723-1740.
- [5] 马金华,林源,费堃桀.企业税费负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来自我国制造业的证据[J].当代财经,2021,436(3):40-52.
- [6] 李紫薇,董长贵.减税降费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2):53-59+175.
- [7] 甘行琼,蒋炳蔚.我国税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果分析——来自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J].税务研究,2019(12):100-105.
- [8] 欧阳华生,程瑶,杨飞.税收负担、产业升级及影响探究:一个国际视野[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35(1):81-91+113.
- [9] 张双龙,金荣学.技术引进税收优惠能否促进企业自主创新?[J].财经研究,2022,48(8):124-138.
- [10] 张学升.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J].财政科学,2021(5):46-55.
- [11] 魏升民,李普亮,梁若莲.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最优宏观

- 税负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2(2):42-55.
- [12] 张国庆,李卉.税收增长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7):36-48.
- [13]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 [14] 朱于珂,高红贵,肖甜.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1,37(19):111-115.
- [15] 原毅军,戴宁.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J].科技与管理,2017,19(1):8-15.
- [16] 刘在洲,汪发元.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4):53-61.
- [17] 彭崇清.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20.
- [18] 李永友,严岑.服务业“营改增”能带动制造业升级吗?[J].经济研究,2018,53(4):18-31.
- [19] 彭晓洁,张建翔,王光旭.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2023,550(5):86-96.
- [20] 储德银,纪凡.税制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诠释与中国经验证据[J].经济学家,2017,219(3):70-78.
- [21] 肖静,曾萍,章雷敏.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J].华东经济管理,2023,37(4):1-12.
- [22] 周诚君.金融业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思考[J].新金融,2021,385(2):4-9.
- [23] 郭旭,孙晓华,翟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测算及时空演变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9):98-116.
- [24] 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27(8):79-81.
- [25]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5):4-16+31.
- [26] 尹李峰,李森,缪小林.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J].财政研究,2021(3):56-69.
- [27] 齐绍洲,林岫,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53(12):129-143.
- [28] 李鹏升,陈艳莹.环境规制、企业议价能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19,40(11):144-160.
- [29] 齐绍洲,张倩,王班班.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市场化激励——基于风险投资和企业专利数据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95-112.
- [30] 任爱华,刘洁,陈小荣.京津冀财政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10):117-122..
- [31] 孙伟增,牛冬晓,万广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以高铁建设为例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22,38(3):19-34+58+35-41.
- [32] 贾敬全,陶冶.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15):151-155.
- [33] 陈楠,蔡跃洲.人工智能、承接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新“索洛悖论”和基于AI专利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22(11):39-57.
- [34] 周骁,郭树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3(1):32-40.
- [35] 王毅,苗转莹,陆玉麒,等.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J].地理学报,2022,77(10):2529-2546.
- [36] 徐青.税收竞争对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21(4):140-145.
- [37] 江静琳,王正位,廖理.农村成长经历和股票市场参与[J].经济研究,2018,53(8):84-99.
- [38] 宋弘,陆毅.如何有效增加理工科领域人才供给?——来自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20,55(2):52-67.

【责任编辑 高志鹏】